

作为讲义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夏晓虹 北京大学中文系

摘要

本文以“讲义”为切入点，还原梁启超1923-1924年在清华学校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著述场景，钩稽此书作为讲义之篇次安排与变动、同时期相关研究与发表情况，并将此书置于梁氏清学史脉络中，考论其社会思潮史、学派史、学科史三分的意义，以及梁氏学术史背后的现实情怀与学生的反响。

关键词：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讲义 清学史
学术史

*作者按：本文所用版本乃据借自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年6月之再版本，是容肇祖先生1938年11月17日购于昆明，叶灵凤夫人赠送的藏书。

1923年9月起，梁启超以国学讲师的身份在清华学校讲学，其中一门一学年的课程¹，其讲义日后整理成书，即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书在学界影响之大，单从钱穆日后有同题之作，蒋维乔亦仿其书名，于1932年出版过《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即可见一斑。

著述场景的还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以“清华学校讲义”的形式印发给修课的学生²，1926年7月由上海的民志书店正式出版，1929年10月已印至第四版。此书依据梁启超开头自述“讲义”之体，版权页署记梁氏为“讲演者”，而非惯常所称之“作者”。有趣的是，该书局似乎是专为刊行这本著作而设，目前尚未见到由其挂名的他种读物。

而在正式刊行前，该讲义部分内容已陆续在南北报刊发表。根据李国俊所编《梁启超著述系年》，可以钩稽出其大致情况：

《清代政治之影响于学术者》，刊1923年12月1日北京《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即第二、三、四讲

- 1 参见梅汝璈《欢迎梁任公先生》，《清华周刊》288期，1923年10月5日；又，梁启超讲、贺麟与张荫麟笔记《怎样的涵养品格和磨练智慧》中提到，“我这学年担任讲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清华周刊》318期，1924年6月13日）。
- 2 梁启超1923年授课时，起码印行过前十二讲讲义，目前尚有少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清华学校讲义”本存世（如国家图书馆、广东中山图书馆有收藏）。而根据修课学生王造时1923年10月27日所写《梁任公先生讲学的态度与听讲的态度》，王对第四讲中的政治谈“想做一篇长文驳辩，不过希望梁先生先把他写出来发表，以为驳辩的根据”（《清华周刊》292期，1923年11月2日），可知讲义的印出时间应滞后于授课。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中、下）；

《清学开山祖师之顾亭林》，刊1924年3月2-6日北京《晨报副镌》，即第六讲《清代经学之建设》之“顾亭林”部分；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刊1924年6-9月上海《东方杂志》21卷12-13、15-18号，即第十三至十五讲。³

不过，恰如梁启超在《清代政治之影响于学术者》的题记中所言，“近顷在师范大学国文学会续讲此题，颇有所增订，未及校改”；这些先行刊发的章节，实在属于未定稿。

以《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为例，其细目起码经过了两次变动。最初，1924年4月23日，梁启超致函张元济，希望将此文“在《东方杂志》先行登出”，并开列出其“所分门类”，共20项：

一、经学，二、小学及音韵学，三、校注古子，
四、辨伪书，五、辑佚书，六、史学，七、方志，
八、谱牒，九、目录学，十、地理，十一、天算，
十二、音乐，十三、金石，十四、佛学，十五、编
类书，十六、刻丛书，十七、笔记、十八、文集，
十九、官书，二十、译书。⁴

3 李国俊《梁启超著述系年》，页220、223、225，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其谓《东方杂志》所刊对应《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三至十六讲，实则截止于第十五讲，尚不全。

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页1016，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其中“古子”原作“古字”，据任心白手钞、张元济手校《饮冰室尺牘》钞本改正。

5月7日，为该文在《东方杂志》刊载，梁启超特撰一小序，其中亦谈及篇次安排，已“凡分十八章”：

一，经学。二，小学及音韵学。三，校注先秦诸子及其他古籍。四，辨伪书。五，辑佚书。六，史学。七，方志学。八，谱牒学。九，历算学及自然科学。十，地理学。十一，政书。十二，音乐学。十三，金石学。十四，佛学。十五，编类书。十六，刻丛书及目录学。十七，笔记及文集。十八，官书。⁵

两相比较，后者新增了“政书”，而去掉了“译书”，又将“目录学”并入“刻丛书”、“笔记”与“文集”合。最终的完成情况则是：

一、经学；二、小学及音韵学；三、校注先秦子书及其他古籍；四、辨伪书；五、辑佚书；六、史学；七、方志学；八、地理学；九、谱牒学；十、历算学及其他科学；十一、乐曲学。

可见，单行本付印时，除“政书”外，梁启超仅写到前述18章中的第12部分。而1924年连载于《东方杂志》者更少，仅得8章，以“传记谱牒学”收尾（没有“地理学”）⁶。此篇率先刊发的目

5 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序》，《东方杂志》21卷12号，1924年6月。

6 《东方杂志》所刊八章，1933年以《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题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过单行本。

的，据著者自白，亦在“就正海内通人。有爱我者，斥其讹谬，订其阙遗”，“俾得于成书时悉遵校改以求完善”⁷。

经由上述的排比，起码可以得到两点认知：一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写作是一件自1923年开始、到1924年5月间一直在持续进行的工作，故报刊所载与民志书店本文字时有歧出；二是即便以现有成果看，此书仍未完稿。著述中断的原因，虽与课业结束有关，也因梁启超夫人李端蕙病重，并终以1924年9月13日去世，梁一直“心绪不宁，不能执笔”⁸。至于全书原拟的结构、规模，目前已不可尽知。但若细查现存文字中留下的蛛丝马迹，仍可稍有补充。

以《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而言，确定要写的章节最少尚有“丛书”与“官书”两目。其在书中留下的痕迹是，《方志学》一章例举《畿辅丛书》、《岭南遗书》、《豫章丛书》等“大举搜集乡邦人著述汇而刻之者”时，即声明：“别于论丛书章牖举其目。”《地理学》一章提到清廷编制的《内府舆图》与《西域图志》，也注云：“详官书章。”⁹故这两处的写作都采用了彼详此略的趋避法。

此外，梁启超预备撰写的学者专论，也至少还有戴震（东原）与章学诚（实斋）两篇。虽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已有多处述及二人，且评价极高¹⁰，但这样的零敲碎打，在梁氏看来，

7 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序》。

8 梁启超《致菊、梦两公书》（1924年9月5日），《梁启超年谱长编》，页1020。梁在清华学校第二学期的授课，也延至1924年5月1日起才开始（《要闻》，《清华周刊》313期，1924年5月9日）。

9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313、324，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10 如谓“戴氏治学，精锐无前”；称章学诚为“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243、304）。

显然既不足以全面呈现戴、章两家的学术贡献，也未能充分传达出其尊敬仰慕之情。因此，于《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的《经学》章中，梁启超一方面推许戴震之《孟子字义疏证》“为清代第一流著述”，同时又称“其目的不专在释《孟子》”，故拟“别于戴氏学专篇论之”¹¹；《史学》章篇末亦声言，“实斋学说，别为专篇”，进至《方志学》章，则更表示：“吾将别著《章实斋之史学》一书详论之，此不能多及也。”¹²而章学诚一篇设定的位置，根据《史学》章开篇所述，应在“第十二讲”¹³，即现在《清初学海波澜余录》处。由此亦可测知，此讲本来可能打算区分为清初、清中叶、清末三部分，将一些具有独特治学品格而无有力传人的学者纳入，各作专篇论说。而这一工作不过完成了三分之一。并且，依据现存讲义本第五至十一讲分别叙说清初学派及其代表者的体例，不仅戴震，甚至包括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都应在未及做出的清中叶与清末学派人物专述中出现。这从第四讲结尾所言“以后便要将各时期重要人物和他的学术成绩分别说明”¹⁴一语，也可得到印证。

既然当初有此规划，现在所见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付诸阙如，梁启超同期的其他撰著中却不乏可观者。1924年1月29日，为纪念戴震诞辰二百周年，梁启超发起召开了“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为此，他专门赶写出《戴东原先生传》、《戴

1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193。

1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298、309。

13 梁启超云：“清代史学，开拓于黄梨洲、万季野，而昌明于章实斋。吾别有专篇论之。（看第五讲、第八讲、第十二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270）其中，黄在第五、万在第八讲，位置无误，故知章原设定在第十二讲述之。

1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31。

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与《戴东原哲学》，分别刊载于当年1月19、20、24-25日的《晨报副镌》上。三文自然可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缺憾而有余。至于可与《戴东原哲学》匹配的《章实斋之史学》，则始终未见。

当然，倘若不限于补阙，梁启超在此期间所著、能够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相互参观、发明者尚有多文。文本最接近者为《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此篇基本是以书中第十讲关于颜元（习斋）与李塉（恕谷）的部分，重新编排、组织而成，材料大体不脱原本讲义，论述亦多直接移用。只是为了回应1919至1921年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来华讲学的学术热潮，梁启超特意于篇首添加了一节文字，叙说杜威宣扬的“唯用主义或实验主义”与“颜李学派”重获重视之间的关联，以为缘起¹⁵。而1924年2月11日撰成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则明言：“本篇专以研究学者产地为主，于各家学术内容不能多论列，文体宜尔也。欲知其概，则有拙著《近三百年学术史》在。”¹⁶说明二者之间仍可互补。即使文字未尝相犯、亦未提及其专著的《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所讲“十二类二十四个人”，其捉对出现的方式及其组合¹⁷，思路也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前半部应和，实可视为其缩写版。

15 参见梁启超《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东方杂志》21卷2号，1924年1月。

16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清华学报》1卷1期，1924年6月。

17 梁启超《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东方杂志》21卷3号，1924年2月。其中所叙人物计有：黄道周和刘宗周、孙奇逢和李颙、顾炎武和王夫之、黄宗羲和朱之瑜、颜元和李塉、徐光启和宋长庚、王锡阐和梅文鼎、徐宏祖和顾祖禹、万斯同和戴名世、方以智和刘献廷、德清和智旭、孔尚任和曹雪芹。除后两组人物未论列，其他均见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而如果再进一步，不拘泥于讲课时段，稍向前延伸，《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撰述又与未成篇的《清儒学案》关合。讲义本于分疏清人“学术史之编著”时曾言及，“吾发心著《清儒学案》有年”¹⁸，已自揭渊源。循此上求，1923年4月3日致张元济信中，梁启超即在谈论：“顷欲辑《清儒学案》，先成数家以问世。”“其第一家即戴东原”，故请张找人代钞戴震所作《〈汾州府志〉序》，因其学案“现将脱稿，故欲知此书来历也”¹⁹。而此文起笔时间，则不晚于3月20日，当天梁有致张函，询问：“戴东原著《汾州府志》《直隶河渠书》两书，涵芬楼（按：上海商务印书馆自建之图书馆）有无藏本？乞饬所司一检见复。”²⁰查《饮冰室合集》所录《残稿存目》，《清儒学案初稿》名下有《戴东原学案稿》四十八页²¹，出处在此。因知梁启超能够“尽十天工夫”赶出有关戴震三文，不仅以“一昼夜之力”撰成“专采前人成文”、间加按语的《戴东原先生传》，而且“接连三十四点钟不睡觉”²²，将近两万字的《戴东原哲学》即神速脱稿，其间固然显示了任公先生的天纵之才，却是前一年编撰的《戴东原学案》，先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按照梁启超当初的估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书约四十余万言”²³，而目前可见者不到三十万字，即至少还有三

18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297。

19 梁启超《致菊公书》（1923年4月3日），《梁启超年谱长编》，页992。

20 梁启超《致菊公》（1923年3月20日），《饮冰室尺牍》钞本。

21 《残稿存目》页2，《饮冰室合集·专集》1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22 梁启超《戴东原哲学》、《戴东原先生传》，《晨报副刊》，1924年1月25、19日。

23 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序》。

分之一的篇幅未写出。即使已经成稿的部分，亦仍有待增删、酌定。其间文字重复者，如《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述“补各史表志”，两次出现“以上总补”的说明文字，显系书目增补后，第一次所写忘记删去。论断存疑者，如论列诸家《荀子》校勘本时，叙王念孙（石臞）《读〈荀子〉杂志》“诸家之说时亦甄采”，夹注云：“惟陈观楼似未见采（？）。观楼极为石臞所推，其书已佚可惜也。”²⁴ 则为王氏推许的陈昌齐（观楼）《荀子正误》，究竟是否在其著作中采引，梁启超尚未查证确实。其他如卷数空缺、字号书名错误之处还有不少²⁵，均未及访补、细察。

虽然可以为梁启超的中断著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未完成帙寻出各种理由，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梁氏自言的“吾学病爱博”，“尤病在无恒”²⁶，总有新的研究课题、著述计划在吸引其注意力。这也是梁启超多部大著作未能完成的根本原因²⁷。而值得一表的是，在这些已经单行的撰述中，《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已经算是部头最大的一册。

回到梁启超的清学史脉络

对于清代学术史，梁启超先后作过三次总体梳理。第一次

2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285、229。

25 朱维铮批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行文“粗率”，“以兄字为弟号，以子著为父书，以既死为方生”（《校注引言》页2，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26 梁启超《题艺蘅馆日记第一编》，《饮冰室合集·文集》16册，卷四十五（下）页52，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27 参见郑振铎《梁任公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页78-81，（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为1904年，梁氏续写已经搁置一年多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成《近世之学术》一章；第二次为1920年，梁“费十五日”²⁸功夫，结撰《清代学术概论》；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已是此课题的第三次演述。三次撰著，在梁启超本是彼此关联的写作。《〈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之引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论清学语，《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二讲开篇之全抄《清代学术概论》第一节，即是明证。而每次篇幅之逐部拉长，由不足万言，到六万余字，最后更增至二十余万，其“旧学商量加邃密”（朱熹诗）的功夫显然可见。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学术史的著述上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模式²⁹。梁启超续撰时，由第六章直接跳到第八章，将原先构拟的标目“衰落时代”与“复兴时代”合一，改题为中性的“近世之学术”。正文也采取了分期论述的方式，以“永历康熙间”、“乾嘉间”、“最近世”三节，简述“起明亡以迄今日”的学术演进历程³⁰。《清代学术概论》同样偏向史论，全书三十三节，将清学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蛻分期”、“衰落期”四段，依此次序，分别进行专题论说³¹。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偏向史述，并且，梁启超本人亦承认，与《清代学术概论》比较，“这部讲义”的“材料和组织，狠有些不同”³²。当然，此语显然也应当包括《近世之学术》在内。

28 梁启超《自序》页4，《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初版、1927年7版。

29 参见笔者《中国学术史上的垂范之作——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5期。

30 见中国之新民（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章《近世之学术》，《新民丛报》53-55、58号，1904年9、10、12月。

31 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3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1。

就全书的“组织”而言，现存《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除第一讲总述三百年学术演进趋势外，大体可分为三部分，即第二至四讲的“专从政治和学术相为影响于[的]方面说”，第五至十二讲的分别评述清初重要学者的学术成就，以及第十三至十六讲对清代学者“所表现的总成绩略分门类择要叙述”³³。其中政治与学术之关系，讲课时本设为一题，故原称“第二章”³⁴；而后来的切分，也是因为所讨论的问题，如满人征服政策的变化与“王学革命”的发生，自然科学研究的戛然中止与考证学的一枝独秀，外来势力的压迫与新思想的吸纳，本来即是依据清初、清中叶、清末的时序提出与展开。故此章的结构可谓纬中有经。以借鉴黄宗羲《明儒学案》形式组织的第二部分也与之相似，虽然对众多清初学者逐一论列，其间却又贯注了分疏学派以厘清线索的用心，故各章标题也多设为“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清代经学之建设”、“实践实用主义”等，而以黄宗羲（梨洲）、顾炎武（亭林）、阎若璩（百诗）、颜元、李塨等及附录诸人的名号作为副题，显示其关注点尤在纵向学术的传承。最后一部分对清学成绩算总账，计分11门类，在章节上构成一种横向的推展。每类所述却是自此学发生、流衍顺序而下，涉及的时段便从清初直达清末，由此构成了各种专学的小史。清代学术阔大的气象，亦凭借集合多条学脉尽情展现。

总观全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实为经纬交织、层次繁复的著述。无论是以问题叙史（二至四讲）、以人物（学派）叙史（五至十二讲），还是以学科叙史（十三至十六讲），史的

3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31、176。

34 梁启超《〈清代政治之影响于学术者〉题记》，《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日。

线索均始终隐含或贯穿其中；与之相对应，三百年学术史也可视为由社会思潮史、学派史与学科史三大板块构成。这样的结构安排，自然使该书与梁启超其他两种清学论著区别开来。

而在“材料”的采辑和各章节内部的“组织”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异于其他二书之处同样十分明显。最特出的是大量图表的使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仅有一表，分四期显示清代学界热点问题的转移情况³⁵；《清代学术概论》则并此亦无。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仅第四讲后附有《明清之际耶稣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以卒年先后为次）》一张大表，学派部分如述顾炎武，亦编制了一份包含36人的《亭林学友表》作为附录。后表之设乃是因顾氏“既老寿，且足迹半天下，虽不讲学，然一时贤士大夫，乐从之游；观其所与交接者，而当时学者社会之面影略可观焉”；而“弟子及后辈附见”³⁶，又使其学术承传脉络清晰。至于学科史部分，由于涉及巨量古籍，书目及其分类也往往以列表的形式出现。如《方志学》章先是一口气开列了116部自康熙至民初“可称者”的地方志，后又制出谢启昆主撰之《广西通志》与章学诚所拟三位一体的《湖北通志》、《湖北掌故》、《湖北文征》各自的目录表，从比较中见出章氏“所改造之方志概念既与前不同，则其内容组织亦随之而异”³⁷。这些图表的采用，一如其日后在清华国学院讲授的“历史研究法”所称许，能够“范繁赜的史事为整饬，化乱芜的文章为简洁，且使读者一目了然”，“可以把许多不容易摆在正文内的资

35 见《新民丛报》58号，1904年12月。

36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31-39、65。

3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300-308。

料保存下来”³⁸，其所呈现的学术景观已大大扩展。而在梁启超，这本是自抒心得的经验之谈。

另外，有别于前此二作的简洁摘引与评说清代学者的著述，各种学术话题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已得到更为充实的论证。学案体本以文献征引“纂要钩玄”（黄宗羲《明儒学案·凡例》）的功力见长，学科史也需要更多细节的展示以彰显学术演变的底蕴与趋势。如此，其长达万言的顾炎武学述，不仅生平介绍的篇幅远超过《近世之学术》的两百余字，而且，单是这一部分，也已与《清代学术概论》留给顾氏的一节两千字的专论字数相当，其他可想而知。需要指出的是，在梁启超的三部史著中，顾炎武一直被推崇为“清学之祖”³⁹，地位之重要毋庸置疑。

梁启超三种著述中关于清代辑佚学的不同阐述，或许可以作为更适当的例证。《近世之学术》的说法最为简单：“本朝学派，以经学考据为中坚。”“以今传之经籍为未完备也，于是辑佚一派出。”⁴⁰《清代学术概论》稍加申说，述其渊源，文亦简短：

乾隆中修《四库全书》，其书之采自《永乐大典》者以百计，实开辑佚之先声；此后兹业日昌，自

38 梁启超讲、周传儒与姚名达笔记《历史研究法》（即《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之《总论》第二章《史家之四长》及《分论三：文物的专史》第五章《文物专史做法总说》，原载《清华周刊》386、439期，1926年10月22日、1928年5月4日；录自《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页37、253，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

39 中国之新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章《近世之学术》，《新民丛报》53号，1904年9月。

40 中国之新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章《近世之学术》，《新民丛报》54号，1904年10月。

周秦诸子，汉人经注，魏晋六朝逸史逸集，苟有片语留存，无不搜罗最录。其取材则唐宋间数种大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最多，而诸经注疏及他书，凡可搜者无不遍。当时学者从事此业者甚多，不备举，而马国翰之《玉函山房辑佚书》，分经史子三部，集所辑至数百种，他可推矣。⁴¹

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辑佚书》一章，始则追本溯源，揭出“最初从事于此者为宋之王应麟”，惟“入清而此学遂成专门之业”；继述“辑佚之举，本起于汉学家之治经”，以惠栋网罗“诸经汉人佚注”为嚆矢；到雍乾间，李绂与全祖望发现《永乐大典》中“秘籍甚多”，因其“以《洪武韵目》按字分编，每一字下往往将古书中凡用该字作书名之头一字者全部录入”，“各书之一部分亦常分隶人名地名等各字之下”；至乾隆中，朱筠“奏请开四库馆，即以辑《大典》佚书为言”，后共辑出385种、4926卷；由此而引发“欲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中曾经著录而今已佚者次第辑出”⁴²的狂潮。而无论《永乐大典》还是其后所辑之书，梁氏又都择要或按类分说。尽管三种文本，长篇丰满，短制精要，各臻其妙；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首尾具备、枝叶丰茂的撰述结构，无疑比三言两语、仅存主干的其他二著更适合作为课堂讲授的读本。

而且，面对学子升堂授课，毕竟与个人著作不妨悬的甚高、追求成一家之言不同，更看重知识的系统性与评价的客观性。如

4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六节，页99。

4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261-263。385种原误作375种，据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中册75页改。

上所述，清理源流既是这部讲义的常态，就后者考量，梁启超三次讨论清学史，著述态度亦有调整。《〈清代学术概论〉自序》即已检讨早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指的是彼时的政治家身份与意识对其写作的侵扰，故此次重新结撰，梁氏决意“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⁴³。《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显然也将其作为先在的准则，编中关于“著学术史有四个必要的条件”之论，尽可视为夫子自道：

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

四条之中，第一、三都涉及力避个人主观好恶态度的影响，可见其重视程度。而梁启超对客观、忠实的极度推崇，在将黄宗羲与陆世仪比较时，更是彰显无遗：本已许为“总算具备这四个条件”的《明儒学案》，遇到陆氏这样“真算得毫无成心的一面镜子”，便映出其“主观的意见，到底免不掉”。梁氏因此称赞陆世仪“是一位最好的学术批评家”，甚至进而设想，陆如做《明儒学案》，价值当在黄著之上⁴⁴。这也是他后来讲“历史研究

43 梁启超《自序》，页3，《清代学术概论》。

4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48-49、98。

法”，强调“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⁴⁵的缘故。

同样标举客观、忠实，《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清代学术概论》的差别在于，凭借充足的史料铺陈，其所下断语更为坚实可信。大体而言，《清代学术概论》对乾嘉学派更多怨词，其间含有作者心态的变化（详见后文）；《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分而治之，将陈述的表彰为主与评论的直揭其失并置，成绩罗列得足够充分，缺失也提点得相当精辟。如关于清儒“各史表志专篇之校注”，梁启超先是大力肯定：“注校旧史用功最巨而最有益者，厥惟表志等单篇之整理。盖兹事属专门之业，名为校注，其难实等于自著也。”而在列举22家的25种校注目录后，梁启超又敏锐地从中抽绎出问题，发现其“关于《地理》者什而八九；次则《经籍》，次则《天文》《律历》，皆各有一二；而《食货》，《刑法》，《乐》，《舆服》等乃绝无”。“即此一端”，梁氏便“看出乾嘉学派的缺点：彼辈最喜研究僵定的学问，不喜研究活变的学问”；“彼辈所用方法极精密，所费工作极辛勤，惜其所研究之对象不能副其价值”。于是感叹：“呜呼！岂惟此一端而已矣？”⁴⁶所发感慨相当沉痛，且由此一点推开去，而与散见全书的论断彼此映发。

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未成完帙，也令其著述重心实际发生偏移。前两种史论尽管简短，历史线索都很完整；《清代学术概论》更因胡适的“责以宜为今文学运动之记述”⁴⁷而作，梁

45 梁启超讲、周传儒与姚名达笔记《历史研究法》之《总论》第二章《史家之四长》，《清华周刊》385期，1926年10月15日。

46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295-296。

47 梁启超《与适之老兄书》（1920年10月18日），《梁启超年谱长编》，页922。

启超也认为，清学“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⁴⁸，故“今文学”既为梁氏撰写此书的目的与出发点，也不妨视为其所论清学史的落脚点与归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因学派史后半的阙失和以乾嘉学者为主的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的独大（约占一半篇幅），主角变成了乾嘉学派，讨论也因此更学术化。

当然，三种清学史最显著的差异还在文体。《近世之学术》与《清代学术概论》均以梁启超所创、流行一时的“新文体”写成，虽则“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⁴⁹，却依然属于浅近文言。而首先以讲义形式印发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意贴近课堂氛围，自以语体文为本色。何况，1920年3月游欧归来，梁启超撰著《欧游心影录》，已与五四文学革命合拍，尽先使用白话文。当年12月起，梁在清华学校初次开设专题课，其“国学小史”讲稿⁵⁰也开始尝试学术文的白话写作。经过三年的历练，功力益深；再配合梁氏擅长的文学笔法，一些枯燥的学问演述也变得生动起来。仅举关于《古文尚书》考证的一段为例：

清初学者对于《尚书》第一件功劳，在把东晋《伪古文尚书》和伪孔安国传宣告死刑。这件案最初的告发人，是宋朝的朱子，其后元吴澄、明梅鷟等继

48 梁启超《自序》页3，《清代学术概论》。

4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节，页142。

50 关于梁启超讲授“国学小史”及其讲稿的考证，参见笔者《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因缘——以新发现的梁启超书札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3期）。

续控诉，到清初，黄梨洲当原告律师做了一部《授书随笔》给阎百诗，百诗便自己充当裁判官，著成《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宣告那部书的死刑。还有一位姚立方（际恒）可以算做原告律师，他做一部《尚书通论》，关于这问题搜出许多证据。其书似已失传，但一部分已被阎氏采入《疏证》了。同时被告律师毛西河（按：即毛奇龄）不服判决，做了一部《古文尚书冤词》提起上诉，再审的裁判官便是惠定宇（按：即惠栋），著了一部《古文尚书考》，把被告的罪名越发弄确实了。还有两位原告律师，一是程绵庄（廷祚）做一部《晚书订疑》，一是段茂堂（按：即段玉裁）做一部《古文尚书撰异》，把毛律师强辩的话驳得落花流水！于是这件案总算定讞了。到光绪末年有一位洪右臣（良品）想再替被告上诉，却是“时效”已过，没有人受理了。⁵¹

能够把学术史写得如此饶有趣味且贴合史实，确实是梁启超特有的本事。以此讲说于课堂，学生必然易于理解、记忆，亦可提起兴致。由此可见，文体的选择在梁氏也应是经过慎重的考虑。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后半部讲义因先交《东方杂志》发表，或为未及在课堂讲授的文稿，不免掺入文言成分，且越向后越多，又说明著述体与讲义体在梁启超那里原有预设对象的区分。

5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181。

学术史背后的现实情怀

采用白话体，已经明白显示出梁启超对当代文化动态的及时反应。而关注现实，原本是曾经久历政治风云的梁氏无法摆脱的情怀，这也成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真正的底色。

其实，即使是此书的命名，用“三百年”而不是“清代”概称全书所指涉的时段，已见出此意。尽管有兼顾清学导源于晚明、乃是对晚明学风的反动的考量，但整部著作最后的时间节点却是设定在当下。这一点，在带有“绪论”性质的第一讲《反动与先驱》便已开宗明义：

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为什么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⁵²

而梁启超讲学之际，不过是民国12年，仍在其认定的“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期内。特别是与钱穆的同名著作比较，梁之“三百年”的“后瞻性”可以看得更清楚：同样从黄宗羲发端，钱著截止于康有为，梁作则延伸到胡适、丁文江，丁的《徐霞客年谱》、胡的《章实斋年谱》⁵³均赫然列入《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尽管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定胡适“亦用清儒

5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1。

5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334、331。

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⁵⁴，以胡跻身其间或许还有道理；但丁文江之撰著既尚未出版⁵⁵，其人又以现代科学家著称，无论如何也不应纳入清学系列。因而丁著的阑入只能解为梁氏的牵挂时下，故勉力把最新的学界研究成果带入书中。

身份的变化在其间也起了作用。1920年撰著《清代学术概论》时，梁启超刚刚欧游归来，此前从政的伤痛记忆犹新⁵⁶，故反省学问与政治的关系，不免对“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多有检讨，而偏向“纯粹的学者”态度，强调“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持此以观，乾嘉学派也获致了高度赞誉：“夫清学派固能成为学者也，其在我国文化史上有价值者以此。”⁵⁷只是，一旦从个体学者进入讲堂，面对学子传道授业解惑，梁氏的立场又稍有改变，学以致用再度成为值得嘉许的追求，甚至成为最高的评价尺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开篇将“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概括为：“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尽管随后的“总而言之”中，也夸赞“这三百年学术界所指向的路，我认为还是不错的——是对于从前狠有特色而且有进步的”，但直接“主潮”后面的解说，却在批评：“可惜客观考察，多半仍限于纸片上事物，所以他的效用尚未能尽量发挥。”⁵⁸这也成为不断在整部讲义中回旋往复的一个主题。

5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节，页13-14。

55 丁文江的《徐霞客先生年谱》刊于其整理的《徐霞客游记》卷首，1928年11月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梁启超以朋友身份，早已了解其著述情况。

56 参见笔者《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梁启超研究”导论之一》，《云梦学刊》2008年5期。

5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三节，页11、80。

58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1、2。

身为导师，从欧游经历所得到的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人生哲学的极度自信，加以对现代教育“完全偏向智识一方面”的反思，梁启超1923年1月9日即将结束在东南大学的讲学时发表演说，便开始大力倡导“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 一、文献的学问 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
- 二、德性的学问 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⁵⁹

前者乃是应和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后者才真正属于梁启超的心得与致力处。南京归来，梁氏立即发起创立文化学院，也依据这一思路，设想此“讲学机关”，“精神方面，力求人格的互发；智识方面，专重方法之指导”⁶⁰。迨9月进入清华学校，有机会实行此方针，故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梁启超往往意取两面：顾炎武的“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二语，正好可解为“一是做人的方法，一是做学问的方法”；而著学术史的几个必要条件中，学者小传之所以不可缺少，也是因为要“看出那人的全人格”⁶¹。异于《清代学术概论》的完全阙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学案部分对概述人物经历已相当用心。即便如此，梁氏仍会抱憾难以活现精神。如其“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想用一篇短传传写他的面影，自愧才力薄弱，写不出来”⁶²。于是，对

59 梁启超《北海谈话记》（周传儒、吴其昌笔记），吴其昌编《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3页，1927年；《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李竞芳记录），《饮冰室合集·文集》14册，卷三十九，页110。

60 梁启超《为创设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晨报》，1923年1月21日。

6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57、49。

6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55。

学者人格的评鉴便随时随处涌现。

这样的指点也因当堂授课的便利，而采取了直接对青年发言的姿态。由讲义改写的《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被张元济赞为“深足药吾中国能坐言不能起行之病，尤足救近人所倡行之匪艰知之维艰之说之偏”⁶³，而其中也保留了讲义中不时插入的现实感慨：“呜呼！倘使习斋看见现代青年日日在讲堂上报纸上高谈什么主义什么主义者，不知其伤心更何如哩！”抄引李搢语录：“圣学践形以尽性，今儒堕形以明性。耳目但用于听读，耳目之用去其六七；手但用于写，手之用去其七八；足恶动作，足之用去九；静坐观心而身不喜事，身心之用亦去九。形既不践，性何由全？”随后，话锋立即转向现在：“这话虽然是针对当时宋学老爷们发的，但现代在学堂里所受的教育，是否能尽免此弊，恐怕还值得一猛醒罢！”⁶⁴而这样的议论，只有放在当时孙中山谈“行易知难”⁶⁵与杜威宣讲“实用主义”的语境中，才能明了其现实指向。梁启超认为颜李学派的实践学说“其精神纯为‘现代’的”⁶⁶，足以和“现代教育思潮”发生关联，道理在此。这一讲也因此在学习史中占有了最多的篇幅。

抱着关切当下的情怀讲学，可以想见，即便是纯粹的史论，也无法避免有为而发。希望做到客观、忠实如“一面镜子”，诚然是梁启超的期盼，甚至因俞樾批评秦蕙田的《五经通考》

63 张元济《致任公吾兄书》（1923年12月17日），《梁启超年谱长编》，页1007-1008。

6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127。

65 孙中山《孙文学说》卷一“行易知难”1919年出版，1922年编为《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见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六卷15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66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105。

“按而不断，无所折衷”，梁还发表过这样的高见：“但我总觉得：‘折衷’这句话是空的，自己以为折衷，别人看来不过多一重聚讼的公案。（注略）所以案而不断，或者也是此书的最好处理。”⁶⁷ 不过，这一坚守中立的宣言，其实抵不过现实思考的侵扰；何况，不下断语也绝非梁氏治学的风格。所以，日后讲论“史德”，梁启超要求“把自己主观意见划除净尽，把自己性格养成像镜子和天秤[平]一样”，却随即承认：“但这些话说来虽易，做到真难。我自己会说，自己亦办不到。”⁶⁸ 而且，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本来也有继往开来的目的。梁启超的追溯既往，正是为了确定此后的进路：“以后凭借这点成绩，扩充蜕变，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的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这回演讲的微意。”⁶⁹ 据此，总结前人工作的得失，实为题中应有之义。

具体到这部偏重乾嘉学派的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于后半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所提示的总体评价与论述策略值得特别关注：

以乾嘉学派为中坚之清代学者，一反明人空疏之习，专从书本上钻研考索，想达到他们所谓“实事求是”的目的。依我们今日看来，他们的工作最少有一半算是白费。因为他们若肯把精力用到别个方向去，成就断不止此。但这是为时代性所限，我们也不能太过责备。至于他们的研究精神和方法，确有一部分可

6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189。

68 梁启超讲、周传儒与姚名达笔记《历史研究法》之《总论》第二章《史家之四长》，《清华周刊》385期。

69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2。

以做我们模范的，我们万不可以看轻他。他们所做过的工作，也确有一部分把我们所应该的已经做去，或者替我们开出许多门路来，我们不能不感谢。⁷⁰

内容组织，……必先略述此学过去之历史，其在明末清初形势何如，使读者得了然于清儒对于此学所努力者在某几点，其努力所得结果有何等价值。每章之末，又附以己见，说明此学尚有某几点应行整理而为清人所未见到或未暇及者，吾个人所认为整理应采之方法亦间论焉。虽曰述史，或亦青年欲求国学常识者之一津逮也。⁷¹

关于清代学者的研究方法，早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即以“科学的精神”概括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亦沿袭此说，称“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故又“给他一个特别名称，叫做‘科学的古典学派’”。取得的成绩多半与其“为学问而学问”的“忠实和努力”⁷²以及采用科学方法分不开。而其研治每一门学问、甚至著作每一部书所垂示的精神与方法，梁启超均不忘抉发。

若从启悟后学的角度讲，更具有建设性的是指出清人的阙失以及指示未来研究的方向。这样高瞻远瞩的指点，非国学功力深厚、洞悉学术思潮者不能为，亦非有自觉的导师责任者不愿为，梁启超恰好三长兼备。以清代经学中的“三礼”研究为例，梁的

70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176。

71 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序》。

7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22、202。

“总评”便极具启发性。虽然首肯其“成绩不能不算十分优良了”，但对于“这门学问到底能否成立”，梁启超又“不能不根本怀疑”。理由一是“所根据的几部经，先自有无数问题”；其次，即便“都是真的，然而几部书成立年代有狠大的距离”，所记各项礼制也很零碎，以清代学者尊经的态度，把“根本不能全通的东西”勉强会通，只能“矛盾百出”，“弄到一塌糊涂”。所以梁启超认为，“他们的成绩虽然狠好，我恐怕这些成绩多半是空的”。如何转“空”为“有”，他也提出了“试换个方向”的建议，即“不把他当做经学，而把他当做史学”。如此，这些关于名物、制度、礼节的琐碎繁重的考证，就“都是中国法制史风俗史……史……史的第一期重要资料了”。就此而言：“清儒的工作，最少也算替后人把所需的资料蒐集在一处，而且对于各种资料相互的关系，和别择资料的方法，有许多意见足供后人参考，这便是他们不可没的功劳。”下面就要看我们后人怎么做了，梁启超倒也信心十足：“我们若用新史家的眼光去整理他，可利用的地方多着哩！”⁷³这一明显具有现代学术眼光的点拨，自是相当中肯，且切实有效。

最能体现梁启超此类化腐朽为神奇思路之高明者，当属对于地方志的看法。本来，“方志中什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位置冗员，钞撮陈案，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然经梁氏以“今日治史者之所需要”观察，却发觉“其间可宝之资料乃无尽藏”；而且，“良固可宝，即极恶俗者亦未宜厌弃”。原因在于：

7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190-191。

以我国幅员之广，各地方之社会组织，礼俗习惯，生民利病，樊然殽杂，各不相侔者甚伙。而畴昔史家所记述，专注重一姓兴亡及所谓中央政府之囿圉画一的施設，其不足以传过去现在社会之真相明矣。又正以史文简略之故，而吾侪所渴需之资料乃摧剥而无复遗。犹幸有芜杂不整之方志，保存“所谓良史者”所吐弃之原料于粪秽中，供吾侪披沙拣金之凭借，而各地方分化发展之迹及其比较，明眼人遂可以从此中窥见消息。⁷⁴

这一由帝王史转变为国民史的新史学理念，早在20世纪初已为梁启超所体察及信奉⁷⁵；更值得表彰的是，梁氏所看重的风俗史、日常生活史、地方史等，仍然是今日史学界正大力推崇的新风尚。其学术意识超前，即此可见一斑。

梁启超身体力行，计划撰写的《中国文化史》⁷⁶，固然有赖于这些经过转化的经学与方志史料，而更应该大力肯定的，无疑是其为后学开启法门的导引之功。其中尤以1925年秋梁氏担任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导师后，亲承警教的学子受益最多，影响不只在读书期间，甚至可及于终身。1920年代初即成为梁氏“私淑弟子”的杨鸿烈，进入清华国学院后，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1930年出版的《中国法律发达史》，正是其当时的“专题

7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299-300。

75 参见梁启超《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分刊《清议报》90册，1901年9月；《新民丛报》1、3、11、14、16、20号，1902年2-11月。

76 梁启超《原拟中国文化史目录》（《饮冰室合集·专集》12册，卷四十九，页19-20）分为二十五编，1925年9月在清华学校讲授、并印成讲义的“社会组织篇”尚不在其中。

研究题目”⁷⁷，其中上古至西汉各章，多有引用清人经学（包括礼学）之处。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关于先秦子书校注的意见，如不满于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希望有人重新整理”此书，指认《老子》、《庄子》、《列子》“这三部书清儒没有大用过工夫”⁷⁸，诸说在高亨身上最见成效。高氏入学时报的研究题目为《诗骚绵字辑释》，毕业汉文则改为《〈韩非子集解〉补正》，日后又撰成《老子正诂》、《老子注译》、《庄子今笺》、《诸子新笺》（包括《庄子》、《韩非子》等六种）等，故以“擅长小学及周秦诸子”⁷⁹著称。梁启超所说：“初入手治史学者，最好择历史上自己所敬仰之人为作一谱，可以磨炼忍耐力，可以学得搜集资料运用资料之法。”⁸⁰有志于著《中国史学史》的姚名达，在校三年，不但专攻梁氏未及动笔的《章实斋之史学》，而且率选完成了《邵念鲁年谱》与《朱筠年谱》，后来更拟撰包括《梁启超年谱》在内的《史家传谱丛书》11种，且大半均已完成⁸¹。虽然不能将上述诸人的撰著全部归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直接启发，但该编为诸人熟读，所述治学门径，梁启超平日言教中也会带出，则无疑问。

77 见杨鸿烈《回忆梁启超先生》，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页235，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页34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78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232。

79 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页339；高亨《高亨自传》、周传儒《自传》，《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页109-111、95。

80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334。

81 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页339、341；王咨臣《爱国学者姚名达生平及其史学思想》，《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页161-163。

虽然提前编写了讲义，但可以想象，实际演说时，梁启超兴之所至，应该会有许多脱稿而出的话。讲学的通例如此，本不足为奇。倒是这些溢出讲稿的部分所讲何事，令人感兴趣。梁氏既未补录，可能是要减省笔墨，也有可能是避免引起麻烦。而从当年清华学生王造时所写《梁任公先生讲学的态度与听讲的态度》中，幸好可获闻一二。第四讲末后叙述晚清的“新思想运动”，梁启超把它分为“我自己和我的朋友”、章太炎、严复、孙中山四支，讲义中关于孙的介绍，只有如下不偏不倚的几句：“他虽不是个学者，但眼光极锐敏，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⁸² 若按照王氏的记述，梁启超的现场演讲其实还夹杂了不少政治道德的评价——“他似乎以主义为手段，以争权为目的，他虽然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开山祖，但他不是为学问而研究学问，他是为投机而提倡此说；他是一个没有什么学问的人，他是一个投机的政治家。”由于梁启超“当场说过，他自己与孙先生始终不合作”，王造时因此判定，“可见梁先生存有偏见，含沙射影”。特别是，王眼中的梁为“一个国学的泰斗，同时又是政治上的落伍者”。于是，他对梁启超讲学的态度提出两点意见：“第一宜不谈政治，第二宜去除偏见。”⁸³ 而即以王造时提供的一例两相对照，在说出的和写出的缝隙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应该还有不少压在纸背的政治谈。而这类余话从讲义的消失，也可以说明梁启超还是明白应当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划出界限。

除了对掺入政治谈表达不满，就学术争鸣而言，课堂内外

82 见梁启超《清代政治之影响于学术者》，《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日。

83 王造时《梁任公先生讲学的态度与听讲的态度》，《清华周刊》292期，1923年11月2日。

的互动也相当精彩。现在所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四讲后面，附有一张《明清之际耶稣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以卒年先后为次）》的表格，听讲学生张荫麟读后，鉴于“此表实为研究明末西方学术，宗教东输之重要资料”，因就其中三点可疑处质询梁启超。梁复信云：“该表采其（按：疑为衍字）自日本人著作，而其人又采自欧籍，并未著明出处，其中讹舛，盖不免也。”张不满足，“继续研究，又得其中遗漏错误者二十余事”，撰成《中国三百年学术史附表一（明清之际耶苏[稣]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校补》，“以质正于任公先生”⁸⁴。尽管梁启超随后兴趣转移，无暇修订旧作，而其讲学引发了张荫麟的继续探究，张氏并能以学生的身份补正先生，正是梁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演讲成功的最佳示例。如此教学相长的境界，至今引人神往。

一部编写于90年前的学术史著作，今日读来，仍令人兴味盎然，感觉新意迭出；近年来，此书也不断重印，版本众多——凡此都昭示：梁启超的学术时代并未过去。

2011年8月22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责任编辑：张惠思）

84 张荫麟《中国三百年学术史附表一（明清之际耶苏[稣]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校补》，《清华周刊》300期，1923年12月28日。

Chinese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Recent 300 Years as Lecture Notes

Xia Xiao Hong,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puts into context the masterpiece of Liang Qichao entitled *Chinese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Recent 300 Years*. This masterpiece has been compiled in the form of lecture notes when Liang taught the subject in Tsinghua University between 1923 and 1924. Besid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writing in context, i.e. looking at how Liang Qichao weaved and changed the lecture notes to better present his ideas. It also reviews the related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during the same period.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lso views the masterpiece in the context of Liang Qichao's research on Qing Dynasty, highlighting its significance on the studies of social thought history, intellectual school history and academic history respectively. Finally, it discusses his reality concerns behind academic research and the students' response.

Keywords: Liang Qichao

Chinese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Recent 300 Years

lecture notes history of academic Qing academic history